

# 文学与空间的互动：词僧的地域分布、成因及影响研究

周梦<sup>1\*</sup>

(<sup>1</sup>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88)

**摘要:** 经分析, 在地域分布上, 词僧集中于南方地区, 尤以江浙为多。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既源于各地区崇佛程度、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的差异, 又和南方地理环境与词审美特质的契合相关。而地域影响下的释家词在写作传统、题材内容、审美特质上均呈现出了显著的南方化特点。同时, 南方内部亦因地理风貌与人文传统的差异, 而使词作呈现出地域性分化。总体而言, 释家词与地域空间的互动是双向乃至多维的: 地理环境塑造了词的题材与风格基调, 而词人通过文学实践, 又将自然空间重塑为蕴含禅理、情感与文化记忆的文本空间与社会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入手, 揭示地域空间与释家词的互动, 有助于拓展佛教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 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跨学科案例。

**关键词:** 词僧; 释家词; 地域分布; 文学地理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732>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pace: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Lyric Monks

Zhou Meng<sup>1\*</sup>

(<sup>1</sup>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lyric monk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especiall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The imbalance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not o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Buddhist worship, economic leve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an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yri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Buddhist lyric also showed distinct souther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writing tradition, subject matter, and aesthetic features. Meanwhil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in the south, lyric shows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Overal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t lyric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s bidirectional and even multidimensional: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hapes the subject matter and style tone of the lyric, while the lyric, through literary practice, reshape the natural space into a

**基金项目:** 2024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释家词写作传统研究》(项目编号: ZGW24204)

**作者简介:** 周梦 (1990-), 女, 江西南昌,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佛教文学

**通讯作者:** 周梦, 通讯邮箱: 995687609@qq.com

textu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that contain Zen philosophy, emotions and cultural mem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space and Buddhist Lyric helps to expand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Buddhis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cross-disciplinary case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Keywords:** Lyric Monks; Buddhist Lyric;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Literary Geography

## 引言

佛门历来视吟诗赋词为“小道”“外学”，非释家之分内事，加之“诗庄词媚”之见，词之遭鄙，较之诗犹甚。职是之故，古代释家词散佚严重，研究寥寥。20世纪以来，随着释家文学渐入学人视野，不少学者亦措意于释家词的推介、发覆、整理与研究。通过搜检教内外典籍，得释家词两千余首，经研究发现，这些作品在创作上呈现出显著的“同构异质”特征：一方面，词僧群体因共通的宗教信仰与修行体验，其创作在主题取向、意象选择、审美风格上表现出高度趋同性；另一方面，具体到个体创作，又因时代语境、人生阅历、个性气质的差异而各具面目，绝非千篇一律的程式化书写。这种矛盾统一的创作生态，深刻折射出创作者的地域文化基因对文学表达的深层塑造。

作为文学理论中兴起的交叉学科，“文学地理学”聚焦文学与地理空间的互动，着重探究文本中的地理空间、文学景观等要素如何在深层次上塑造文本叙事、人物身份，以及文化想象等。<sup>[1]</sup>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不少学者较早就措意于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研究宗教文学，揭示宗教文学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例如，高慎涛《北宋诗僧地域、宗派分布的不平衡及原因分析》<sup>[2]</sup>，李舜臣、欧阳江琳《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sup>[3]</sup>，韦德强《元代中后期诗僧地域分布考述》<sup>[4]</sup>、彭敏《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sup>[5]</sup>、李舜臣《南北佛教文学不同论——以宋辽对峙时期为例》<sup>[6]</sup>等。这些研究或寓目于不同时期诗僧的地域分布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或揭示特定时期佛教文学的地域差异，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开拓了新视角。然在这些研究中，却鲜有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研究词僧的地域出身与地域空间对释家词的影响。实际上，较之诗僧，地域特征在词僧中还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将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切入，通过勾勒词僧群体的地域分布图谱，继而从自然环境、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维度解析其成因，最终探讨地域文化如何渗透于释家词的题材选择、意象营造、风格形成等创作层面，进而揭示空间生产与文学表达间的密切联系。该研究路径既是对佛教文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亦为理解中国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生成逻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 1 词僧的地域空间分布

通过披阅典籍，共搜检到有词存世的词僧138位。考虑到释子僧籍的流动性强，不便统计，而俗籍作为释子的籍贯更具固定性，且是释子的出生成长之地，对涵养释子性情、孕育释子才情具有重要影响。故在地域的分布统计上，此处以释子俗籍为先。而对于俗籍不明者，则考虑其僧籍，从弘法地域角度入手，窥察其地域分布特点。经分析发现，词僧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呈现出了显著的南方化特质。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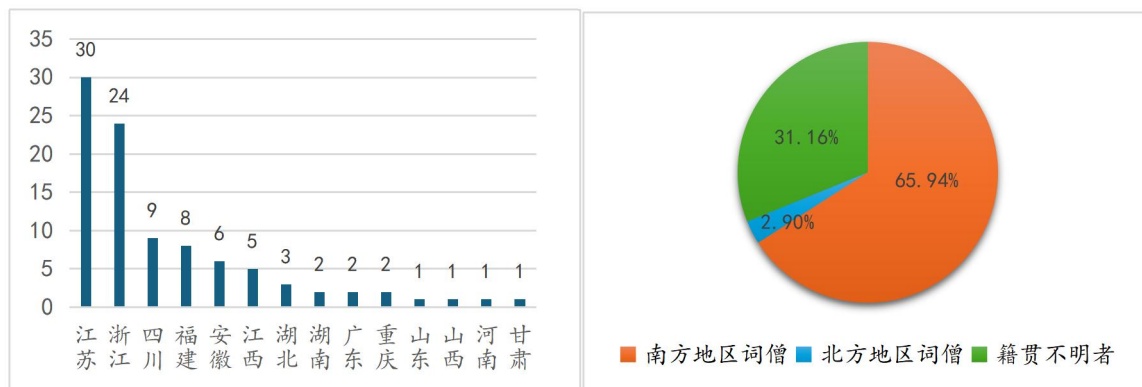


图1 词僧南北地域分布概况

图2 词僧省份分布情况

由上图可知：其一，南方词僧人数最多，在俗籍可考的95位词僧中，有91位隶属南方，比例高达95.79%；北方词僧有4位，仅占4.21%，分别出自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其二，南方地区中，词僧分布较广泛，且内部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其中东南地区最盛，尤以江、浙为最，分别为30人、24人，词僧占比达到了56.8%，占南方地区总数的59.3%。四川、福建、安徽、江西等禅法兴盛之地的人数次之。其三，对于俗籍不明的词僧，经分析其僧籍，其弘法地亦以南方为多，尤其是浙江、江苏。43位俗籍不明的词僧，根据相关资料，查阅到有22位记载了弘法地域，而这22位中就有18位曾经弘法于南方，占总数的81.8%。而从南方地区内部分布来看，亦是以浙江、江苏为最，共13位，占比72.2%。而这亦与那些俗籍可考词僧的地域构成基本一致。同时，具体到各朝代，词僧的地域分布整体而言无显著差别，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词僧在不同时期的省份分布

	江苏	浙江	四川	福建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	山东	山西	河南	甘肃	总计
唐			1					1							2
宋	1	5	4	4	1	3	1				1	1	1		22
金元	1	5													6
明	4	5	2		3		1		1						16
清	24	9	2	4	2	2	1	1	1	2				1	49
总计	30	24	9	8	6	5	3	2	2	2	1	1	1	1	95

经分析可知，自唐迄于清，词僧“南盛北稀”的地域格局基本无甚变化，具体到南方各省，除江苏外，不同时期各省的词僧数量较为稳定，如浙江、四川、福建、江西、湖北词僧的数量在各时期排名均变动甚微。而在清前可考的江苏词僧共6位，至于清则暴增至24位，分别为行悦、济乘、随时、超正、原诘、弘伦、宗渭、元尹、果心、明瑜、大瓊、了璞、达尘、能印、能启、寄尘、上鉴、舒霞、戒显、行昱、本升、济悟、本德、开霁。经考察，这24位词僧除开霁为晚清词人外，其他词僧的生活轨迹基本在明清之际或清初。由明入清，江苏籍僧人数量显著增长，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明清鼎革之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爆发。其核心原因在于，江南地区作为明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与南明抗清的核心区域，在经历政治剧变时，佛教寺院成为了一个能同时容纳政治逃避、生计维持与文化坚守的独特空间。

明朝的灭亡对江南士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与生存危机。清军下江南时的残酷屠戮、“剃发易服”的强制政策，以及随后日益严密的文网，使得许多以气节自许的文人志士面临“不仕新朝”却又无处可逃的困境。此时，出家为僧便成了一条极具象征意义的出路。遁入空门既可以物理上避开新政权直接管控，又能以“形服俱改”的方式婉转应对清廷的剃发令，更在精神上标

榜了与旧朝认同的切割和对新朝的消极不合作。大量的江南遗民，或独自或携亲友弟子集体“逃禅”，瞬间为僧团注入了庞大的知识阶层群体，如澹归、方以智、屈大均等人的人生轨迹便是典型。他们并非全因信仰而出家，更多是将寺院当作了最后的避难所与精神堡垒。与此同时，战乱与朝代更迭带来的社会经济崩溃，将更多底层民众推向了寺院。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赋徭役却依旧沉重。寺院拥有的田产、相对稳定的共居环境以及僧人身份可能带来的赋役减免，对于流离失所的平民而言具有实实在在的吸引力。这就形成了上层“逃禅”与下层“避役”两股人流同时涌入佛门的奇特景象。因此，僧人数量的暴增，既是精神贵族的选择，也是苦难民众的求生之道。

这一现象之所以在江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政治经济原因，还离不开其固有的文化宗教基础。明代中后期，江南佛教本就极为兴盛，高僧辈出，禅林遍布，士大夫参禅学佛之风浓厚，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宗教文化生态。当变局来临时，这套现成的寺院网络与宗教话语体系，能够迅速接纳和“消化”这些突如其来的新成员。许多士人本就与僧侣交游甚密，由儒入释的转换并无太高的心理与知识门槛。此外，清初帝王如顺治帝对佛教的兴趣，以及征召江南名僧入京问道的举动，在客观上暂时抬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或缓冲了这一潮流。而这一切，促成了在明朝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江苏入清后词僧激增的地域分布格局。

综上所述，通过对词僧地域分布的细致梳理与多维度分析，其南方化特征清晰可见，无论是俗籍可考的群体中南方占比高达95.79%的绝对优势，还是东南地区尤其是江浙两地作为核心聚集区的突出地位，抑或俗籍不明者的弘法地域仍以南方为主的延续性倾向，均印证了南方文化土壤对佛教词人群体滋养的深远影响。这种分布格局既与佛教南传后禅宗在江浙、福建等地的兴盛直接相关，也暗合了南方经济富庶、文教发达的区域特质对释子文学创作的催化作用。词僧群体的地域性聚集，不仅塑造了中国佛教文学版图中“南盛北稀”的独特景观，更成为观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文化适应性与地域差异性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当禅宗思想与江南文脉相遇，词僧们用笔墨在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最终让佛教文学的星火在南方水乡的滋养下，绽放出兼具宗教哲思与地域诗性的璀璨光芒。

## 2 词僧地域分布不平衡的成因

词僧群体的地理分布绝非偶然现象，其集中于南方地区，是多重历史力量与地域特质长期交织、共同塑造的复杂结果。南方相对富庶的经济为寺院的兴建与佛教的弘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更直接孕育了一个庞大的、有充足闲暇进行精神创造的知识僧侣阶层。而自宋以降文化重心的南移，则使南方地区形成了浓郁尚文的社会风气与高度发达的文学传统，为释子习文作词提供了丰沃的文化滋养。尤为关键的是，词体本身“要眇宜修”“缘情绮靡”的审美特质，与南方“水势浩洋”“清绮灵秀”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由此孕育的“尚虚无”“重抒情”的文人气质，存在着深刻的同构与共鸣。这三重因素环环相扣，共同构建了一个催生并繁育词僧创作的独特地域文化生态系统。

首先，南方经济富庶，崇佛甚炽。“民有余财，方能施佛财；众有羨利，方能植佛福”<sup>[7]</sup>，若地瘠民窳，“家无百金之产，市无千金之贾，人无捐金乐施之资”<sup>[8]</sup>，即使有崇佛之心，亦无崇佛之力，可见经济发展对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而释家词创作繁荣之南方地区恰好为富庶之地，早在唐时，江南经济即富甲天下，“扬州富庶甲天下，称‘扬一益二’”<sup>[9]</sup>，而扬州、益州所在的江苏、四川恰好皆是词僧辈出之地。而至于浙江亦是物产富饶、经济繁华，《宋史·地理志》云：“两浙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南斗、须女之分。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杭稻之产。”<sup>[10]2177</sup>同样福建于佛教一端，亦是“乐供好施”“每多淫祀”，《宋史》卷八十九记载：“（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sup>[10]2210</sup>仓廩实，民安乐，在强大经济的支撑下，两浙及福建地区奉佛甚笃，多崇佛之举，因之而寺院林立、僧院众多，佛教蓬勃

发展。据记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sup>[11]</sup>而寺院发展直接推动了僧人数量的增加，“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sup>[12]</sup>甚至一度出现“盖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者”<sup>[12]</sup>的现象。寺庙多、僧尼数量夥，直接提高了词僧的产出率，这亦是南方词僧辈出的重要原因。

其次，南方词僧众多，与南方文风炽盛密切相关。随着宋代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南方文化得以蓬勃发展，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sup>[13]</sup>而南方内部的文化发展状况与南方词僧之地域分布亦是一脉相承，比如独占鳌头之江苏，及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在古代皆属文化大省。《容斋随笔》“饶州风俗”条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sup>[14]</sup>《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九亦云：“（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sup>[10][22]10</sup>历史学家刘子健更是直言：“中国近八百年来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以江浙一带为重心的模式。”不仅是江、浙、闽地区如此，词僧数量众多的四川亦是文化繁盛之地，张孝祥曾极赞蜀地：“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sup>[15]</sup>在文化浸染下，其间的释子颇通文墨，人才辈出，比如江南僧汤惠休诗歌风格绮靡清丽，与鲍照并称为“休鲍”；浙江僧释洪偃文采洒落，更善草、隶，“貌、义、诗、书号为‘四绝’，当时英杰皆推赏之”<sup>[16]</sup>；江西僧释克新“文采彪曝”“词章之往还，翰墨之酬酢，殆无虚月”。梅尧臣《答新长老诗编》亦慨叹：“江东释子多能诗，窗前树下如蝉嘶”，所言不差矣。

除此之外，南方多词僧，还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南方的地域风貌更契合词的审美特质。文学因所处地域的气候、山水等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地域特色亦颇为显著。魏征即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sup>[17]</sup>指出了南北文学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各具风貌，北方文学质实而适宜策论等实用之文，南方文学清绮而宜于诗词等吟咏之体。而这实际是与南北的地域差异相关。“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文章风格受到了“声音”的影响，而“声音”又与地域密切相关。古代音分南北，南声之始，起于淮汉，北声之始，起于河渭，“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sup>[18]</sup>其中，可看到南北文学特质与其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人（尚实际）→文（记事、析理之体）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人（尚虚无）→文（言志、抒情之体）

地域环境影响了人的性情，而人之性情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以南方地域风貌为例，山林泉响、流水潺潺的温润环境，涵养了生于斯长于斯之人多情而尚美的浪漫特质，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即感情丰沛、词藻华美、情思旖旎等文情特质。受此影响，南方文士尤精于以抒情见长的诗词歌赋，而北方文士则擅策论等实用之体。宋人冯拯云：“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sup>[19]</sup>南、北士人所擅文体的差异，即地域环境影响区域文学创作的结果。

刘师培言：“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诗赋、词皆应列其中，而在抒情上，词较诗尤甚。谢章铤云：“言情之作，诗不如词。”<sup>[20]</sup>查礼曰：“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sup>[21]</sup>词的长短句式，极大地增加了词在表达意绪时的自由度和层次性，扩大了词的抒情容量，并由此构成了词体独特的或旖旎绵密、缱绻回环，或激越飞扬、奔泻跌宕，适宜于歌哭悲欢之情绪宣泄的特性。严迪昌先生言：“词的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而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词的抒情功能起落消长的同步历程。”<sup>[22]</sup>可见，词为言情之体，

抒情是词之核心特质。长于抒情、文采清绮的词体，与南方温山软水的地理环境，与“缘情绮靡”的南方文学传统高度契合。

词之审美特质呈现了显著的南方特性。首先，词轻婉纤柔的意象特点与清纤灵动的江南风貌相通。江南风景秀美而富于变化，人们常以“骏马西风冀北，杏花烟雨江南”来凸显南北方的风物差异，杏花、烟雨、双燕等柔婉物象基本成了江南的代名词。同样，词体意象亦更多倾向于细柔、优美之物，常见飞花、秋月、微雨、晓风、杨柳等，即使有壮大开阔的物象，也会以空灵静怡之笔，将刚性阔大之体性收归轻婉纤细之中，而这正与江南的柔性特质一致。其次，词要眇宜修的婉转表达与江南蜿蜒破碎的地貌特征一脉相承。清人汪小竹《香草词序》曾言：“凡情与事，委折抑塞，于五七字诗不能尽见者，词能短长以陈之，抑扬以究之。”<sup>[23]</sup>而江南多山和丘陵的地貌特点，亦使其景具有百转千回的跌宕之美，这与词绵延不尽、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实乃相通。另外，词清空幽谧的意境特点与水润轻灵的南方环境亦相得益彰。词常以跳跃性结构和特殊的意象组合，营造出绵密深远、沉静幽谧的优美意境，张炎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sup>[24]</sup>而水乡泽国的江南风景优美、清灵，深契词体清空轻灵、婉约委曲的特质，两者在意境追求上别无二致。不仅如此，江南莺飞草长、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美景，亦益于词人激荡文情。同时，僧人多山居，“天下名山僧占多”，而南方群山环壑，千峰竞秀，实为僧徒修习、游方的绝佳选择。宋人余靖即云：“大抵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竞秀，万壑争奇，所以浮图之居，必获奇胜之域也。”<sup>[25]</sup>身临此等殊胜之景，释子抒发词情也更为容易，这亦不失为南方词僧辈出的重要原因。

而词体的审美内蕴与南方地域的契合，也很好的反映在释家词创作中。反观存世的释家词，从江南杏花雨雨的意象到蜿蜒破碎的地貌，从水润轻灵的环境到群山环壑的修习胜地，南方地域的每一重特质都成为词体生长的沃土，使僧词烙印了鲜明的南方印记。例如，清初江苏无锡僧弘伦，其八十一首词作即浸润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氤氲气息与细腻肌理。首先，其词是江南水乡地域风格的具象呈现，构建了一个以水为脉络的灵动世界。无锡地处太湖之滨，河道纵横，这使他的词作充满了水的意象与韵律。《清平乐·画溪》开篇便是“画溪春涨，双桨桃花浪”，溪水、双桨、浪花，勾勒出典型的江南春航图。《河渚神·了姑庙》中“枫根擷网系渔槎，渔娘满髻黄花”，渔舟、渔网、渔娘，生活场景与水紧密相依。水不仅构成背景，亦影响其词句的节奏感，如《一斛珠·怀红友》“一樽惜别关河香，一缄乡信音尘悄”，句法流转，如波光潋潋，带有吴语般的柔婉与绵长。同时，他的词精确捕捉了江南四时风物的细腻变化与清雅格调。“白豆花开，红藕香残”的夏秋之交，“细雨输凉，栖乌噪晚，归垄犁盘落梨花”的田园暮景，都体现出词人对物候精微的观察。《虞美人·西溪晚眺》中“菡萏柔蓝秋水似裙腰”，将秋水比作女子裙腰，设色明丽，比喻新颖，在清寂中寻觅艳色，在自然中窥见人情，体现了江南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其次，弘伦词作的“南方性”，还深刻体现在其词整体萦绕的哀婉感伤基调与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上。这既是江南文学“阴柔美”传统的延续，更是明清易代之际，作为遗民的集体心理创伤的体现。他的愁绪，常常与江南特有的景象交织，例如《鹧鸪天·松陵江上》“一船离恨疏疏雨，莫怪吴娘两桨迟”，离恨化入迷蒙细雨，是典型的南方愁思；又如《减字木兰花·寒宵》“衾窝一摺，絮絮吴绵还似铁”，连御寒的吴绵都显得冰冷沉重，极写身心孤寒。这种哀婉，在怀古与羁旅题材中升华为一种历史的空幻感与人生的漂泊感。《满江红·雷塘》凭吊隋炀帝旧迹，写“宫缆牙樯悲逝水，铜麟绣瓦埋荒棘”，繁华尽付流水，荒棘掩埋宫瓦，其深沉的兴亡之叹，与无锡、扬州等地深厚的历史积淀息息相关。而作为僧人，他的漂泊又多了层宗教意味，《鸭头绿·秋月下看渔人晚集》中“雨笠烟蓑，浮家泛宅，一生心事白鸥边”，表面写渔人，实则是自我“浮家泛宅”、心向鸥鹭的写照。南方的山水，既是慰藉，也是愁绪的触发物。

弘伦的词，是地理江南与心理江南的高度统一。江苏的水乡风貌、物候风情，塑造了他词中清丽灵动、细腻婉约的意境基底；而南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命运，以及深植于江南文化中的感伤

气质与隐逸理想，则铸就了其词哀婉深沉、含蓄内敛的情感内核。他的僧人身份，为他观察这片土地提供了既疏离又深入的特殊角度，使其词在烟水迷离之外，另具一份哲思与空寂之美。因此，弘伦的词作，堪称清初江南地域文化在个体心灵中投射出的一个深邃而完整的艺术缩影，其中每一处波纹、每一片落叶，都诉说着来自水乡与时代的双重回响，浸染了丰富的南方地域特色。这种南方特质，在其他释家词中亦为普遍，这也从另一角度诠释了词体与南方地域的审美契合。

综上，词僧地域分布的显著“南方化”，是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南方经济的持续繁荣，为佛教寺院的林立与僧侣群体的壮大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使得有文学才华的释子能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潜心创作。而自中古以降，文化中心南移所造就的“冠带诗书，翕然大肆”的文教盛况，则使南方社会形成了深厚的尚文传统与高超的文学技艺，为词僧群体的文学素养提供了普遍而高水平的文化熏陶。最终，词体文学那与生俱来的抒情性、婉约性与意境美，与南方温润秀逸的山水地貌、细腻空灵的美学传统达成了高度的精神契合。这种由地理环境所孕育，又为文学形式所强化的“南方特质”，使得词这一文体在南方找到了最适合其生长绽放的文化水土。

### 3 地域空间与释家词的交互建构

地域与文学的关联，自古便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刘勰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sup>[26]</sup>刘勰“江山之助”的精辟见解，揭示出自然风土对文思的深刻滋养。对于活动空间相对稳定、心灵世界又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词僧群体而言，这种“助缘”体现得尤为鲜明。纵观释家词的创作版图，南方是其核心孕育空间，水乡泽国的地理风貌与钟灵毓秀的人文环境，共同为其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南方印记”。然而，空间对文学的影响绝非单向的投射或简单的背景衬托。地域空间作为一种能动的力量，深度参与了释家词从形式、题材到审美风格的全过程建构；同时，词僧们又以其独特的宗教体验与文学实践，对地理空间进行反哺式的“书写”与“重塑”，将物理的山川转化为富含禅意与诗情的文化符号。这是一场文学与地理间持续不断的对话与彼此生成。

词僧多出于南方，地域影响下的释家词烙印了深刻的南方印记。其一，是写作传统上的南方特色，突出表现为多渔父词、竹枝词、乐隐词等极具南方地域特点的禅门书写。《释氏要览》记载，“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越人名臈婆，取菩萨八相缉为歌曲，令敬信者闻，生欢喜心。今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又南方禅人作《渔父》《拨棹子》唱道之词，皆此遗风也。”<sup>[27]</sup>地分郑魏，声亦参差，有南北之分，而《渔父》《拨棹子》实为水乡江南的专属词调，有鲜明的地域色彩。郑阿财曾言：“今传世《渔父拨棹歌》盖为流行于吴越之曲调，词作大抵出于南方禅子之手。”<sup>[28]</sup>船子德诚《拨棹歌》39首即船子三十年来“寄一叶舟，往来华亭、朱泾”的产物。因南方释子众多，其“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情满于水”，常借渔父词唱道乐情，以至于禅门形成了以渔父词唱道的写作传统，历代唱诵不绝。不止是渔父词，释家词中亦极多《竹枝词》《杨柳词》之书写，而竹枝词乃典型的南方化词调，宋郭茂倩云：“《竹枝》本出于巴渝。”<sup>[29]</sup>清万树《词律》亦言：“竹枝之音，起于巴渝。”<sup>[30]</sup>释家词中常见以竹枝词咏巴蜀、西湖等南方胜景，如释元璟写有《东湖竹枝词》《西湖竹枝词》《厦门竹枝词》等23首，开霁著有《僧家竹枝词》48首，杨维桢所编《西湖竹枝词》中亦有诸多释子之作。加之江南多名山，山中多古寺，素有山居传统的释子不乏山居词、乐隐词的写作，如中峰明本、憨璞性聪、鹤峰济悟、樱宁智静等都写有大量乐隐词，而这俨然形成了独特的禅门写作传统，而这些写作传统皆为典型的南方书写，实为受南方词僧地域影响的产物。

其二，是题材内容上的南方特色。南方的林塘佳处、汀烟渚圃激荡着词人思情，释家俗世词中常见南方佳地、胜景的歌咏，比如钟灵毓秀的江、浙，就常见于释家词，仲殊《南徐好》组词即题咏江苏南徐的十处胜景，南徐即镇江，有镇江二十四景之说，仲殊所咏者即瓮城、花山李卫

公园亭、绿水桥、沈内翰宅百花堆、刁学士宅藏春坞、多景楼、金山寺化城阁、陈丞相宅西楼、苏学士宅绿杨村、京口十景。而至于赞杭州西湖者亦不胜数，如惠洪《浪淘沙》（山径晚樵还）即因西湖而作，其云：“自南游，多崇冈，陵峻岭，略见西湖秀色，用和靖语作长短句云”。而如“荷十里，桂三秋，毕竟西湖好”之句则屡见于释家词。而这与词僧的地域分布恰好契合。此外，清代释元尹《浪淘沙·十景题》吟颂的是江西庐山十景，即东林晚钟、金沙暮雁、溪桥映月、山塔插云、雪洞喷凉、鉴池承照、晓阁观霞、春台眺野、松径筛阴、薛亭锁翠。其《秦楼月·十趣目》更是从多角度赞美东林寺的春、夏、秋、冬、山、水、花、鸟、人、境。除了南方胜景，南方风物亦频繁见诸释家词，如澹归《点绛唇·蕉子》《点绛唇·菠萝蜜》《点绛唇·椰子》《点绛唇·竹枝笋》《点绛唇·桃榔》《点绛唇·三廉》《点绛唇·鹰爪兰》《点绛唇·火秧》等，是澹归寓居岭南所写。“三廉”者，“粤人呼稜为廉，九廉极难得，或谓能截疟也，花紫白成穗，老干亦时绽出，一年两熟，花与果长相见”，可见，三廉与蕉子、菠萝蜜、椰子、桃榔等皆为广东的地方产物。而至于大汕《醉蓬莱·忆岭南柑子》、行悦《踏莎行·岭南作》等，皆是岭南的文学书写，在释家词的写作对象上呈现了浓郁的南方化倾向。

其三，是词作风格上的南方特色。南方因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而浸染着清婉俊逸的气质，“吴越暖景，山川如绣”，“自江之南，号为水乡”，水乡泽国、莺飞草长地理风貌下成长的释子们，其词表现出了婉丽清逸的审美特质。惠洪《西江月》写舟行烟波之慨思，其云：“大厦吞云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雾窗春晓翠如葱，睡起云涛正涌”。景之幽美，境之空灵，人之清雅，引人遐想，使人神清气爽，尘俗尽消。又比如，如晦《卜算子·送春》曰：“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毕竟年年用着来，何似休归去。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风急桃花也似愁，点点飞红雨”。则着眼于花落水流红的悲凄，全词笼罩了浓郁的江南哀愁。而仲殊“开到杏花寒食近”、原诘“杏花雨细，驱车南陌，杨柳风柔”、宏伦“买到杏花来燕子，已过了二分春”、绣铁“茜衫红映杏花寒”等，皆以江南代表物象“杏花”入词，不仅使其词浸润了典型的江南风物，也使词作沾染了江南杏花烟雨清婉空灵的审美特质。而这种“清空”的审美偏好，在释家词中也体现为对空灵意境的极致追求，例如，船子和尚《拨棹歌》“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以“空船”“明月”等意象构建出虚实相生的禅境，既无北方佛教文学的厚重感，亦非文人词的秣丽雕琢，而是以简练笔触传递出“空即是色”的哲学深意。

释家词除了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南方地域特色，具体到南方内部各地区，亦因地理风貌与人文传统的差异，而呈现出地域性分化。江浙地区河网密布、山水秀润，词风偏于清婉空灵，题材多聚焦园林楼台、水乡风物与四季景致。澹归“楼台间出绿阴浓”“前歌后舞，有雨花、深拥楼船”，以工笔点染江南楼船风光，呈现“楼台翠壁摇烟水”的精致画面；惠洪笔下“水痕无底照秋宽，好在夕阳凝睇处，数笔秋山”的西湖暮色，浸润着水墨般的静谧禅意。这种创作将江浙山水高度审美化、意境化，生产出文人化与禅意交融的江南诗学空间。又例如逸庵济日的《浣溪沙·雨后郊行》：“草满郊原水满川，携筇正值雨余天。数声啼鸟落花前。小艇渔人归远浦，野桥杨柳舞轻烟。青山依旧白云边。”近处草长水满，落花沾衣；中景渔舟返棹，柳桥含烟；远景青山白云，苍茫无垠。全词未见浓烈情感或深刻哲思的直白倾诉，却在风物交接处、动静相生间，将雨后漫步的闲适与超然，化入湿润的空气与朦胧的烟光中。观察细腻，笔触淡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亲近自然、寄情山水的审美情趣，极具江浙词僧的创作风格。

相较之下，巴蜀地区的释家词，因船子德诚的渔父传统，词作融汇了渔父词纵情山水、任运自然的闲适之情，以及无所遮掩、毫无挂碍的禅悟之境。虽然船子和尚《拨棹歌》乃其“寄一叶舟，往来华亭、朱泾”的文学产物，取景的是江浙一带的秀美风光，但因船子为四川人，故后世的四川词僧多沿袭其渔父词写作传统，常见渔父题材与水乡风物的写作，如佛冤彻纲《和船子和尚拨棹歌》19首。又例如雪窦重显《渔父》：“春光冉冉岸烟轻，水面无风钓艇横。千尺丝纶在方寸，不知何处得鯢鲸。”春日迟迟、烟水无波，钓艇悠然横卧，渔父手持丝纶，仿佛与世无争。

“千尺丝纶在方寸”一句陡然转折，将外在的广阔江天收束于方寸之心，暗示真正的“垂钓”并非为了水中之鱼，而是心性之修。那“不知何处得鲲鹏”的悠然一问，将意境推向玄远——渔父所寻觅的，并非凡鱼，而是庄子笔下化鹏遨游的北冥巨鲲，是超越形骸、游心大道的精神象征。全词以淡然的笔触勾勒出一幅静谧空灵的江春垂钓图，却在内里暗涌着超脱世俗的禅机与深远的生命追问，寄托了对生命终极自由的悄然向往。与此同时，福建地区濒海多山，佛教基础深厚，江西作为禅宗重镇，理学亦盛，其释家词更注重哲思的提炼，与宗门公案结合更紧，在自然描写中透出理性观照的色彩。例如，庐山作为江西佛教圣山，释元尹以组词题咏其“东林晚钟”“雪洞喷凉”，不仅写景，更赋予其深厚的历史与宗教意义，使庐山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佛教记忆与文学书写的复合文化空间。

在释家词的创作与传播中，词章深受地域文化的滋养，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并非被动反映地理环境，而是通过文本书写、意象建构与文化实践，能动地塑造、表征甚至生产出具有特定意义的地理空间。词僧的创作将自然地理转化为承载宗教体验、审美情趣与社会关系的文化场域，使物理空间被赋予精神意蕴。例如，船子德诚于华亭、朱泾间往来垂钓所作《拔棹歌》，在江南烟波水泽的景致描写中，还以“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的意象，将江河湖泽转化为禅悟的隐喻空间——水流舟行之地，同时成为智慧传递之途。这种文学转化，使“渔家水乡”超越地貌概念，成为兼具隐逸色彩与禅悦特质的文化符号。这种表达在后世禅宗渔父词中被沿袭下来，憨山德清、佛冤彻纲、佛敏寂讷等均有类似创作。例如憨山德清《清江渔父词二首》其一：“水清沙白月如钩，影落波心钓未收。无限游鱼吞不得，空教渔父抱深愁。”一叶扁舟往来江海，影落波心，风月在水，一个徜徉自然、任运随心的渔者形象，在水清、沙白、月明的自然澄澈中，洞察清静无染的禅心与禅境。经由词僧的文学实践，自然地理空间转化为了承载禅思、情感与社交的复杂场域，月下的水波俨然成为了禅悟的空间载体。

除此之外，文学对空间的“生产”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实践场所的建构中。寺院在释家词的创作中，常成为联结僧俗、酝酿风格的社会空间。例如，杨维桢编《西湖竹枝词》汇集多方词作，西湖周边的寺院便成为文人墨客与诗僧唱和的枢纽，形成一个以地缘与文缘为纽带的文化交往圈。这种唱和网络超越了物理场所的局限，使词作在流动中形成共同的审美取向与表达传统。例如《渔父》《拔棹子》等词调在禅门的流行，既是南方水乡生活的反映，也是通过词僧们的唱和次韵，将其演变为禅门唱道的专用曲调，从而生产出一种具有宗教仪式感的文学空间。在此空间中，词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修行实践与群体认同的媒介。

综观所述，地域空间与释家词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气候，塑造了释家词清婉空灵的整体美学风貌，并催生出渔父词、竹枝词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文体传统，其内部亦因江浙、巴蜀、闽赣等亚区域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的风格变奏。另一方面，词僧的创作绝非被动摹写。他们通过意象的提炼、意境的营造以及唱和网络的构建，能动地将自然空间“文本化”与“意义化”。船子的烟波、仲殊的楼台、澹归的岭南风物，皆已超越其物理存在，成为承载禅悟、情感与群体认同的精神性空间。文学与地域的互动，共同构成了释家词中丰富而深邃的空间美学。

## 4 结语

通过系统梳理 138 位词僧的俗籍与弘法轨迹，研究发现，词僧的地域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南方化特征，尤以江浙地区为核心聚集区，形成“南盛北稀”的独特景观。这一分布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南方经济富庶、文教发达、禅法兴盛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南方温山软水、清绮灵动的自然地理环境，及词体“缘情绮靡”的审美特质深度契合南方地域的必然结果。在文学创作与地域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地域空间对释家词的创作影响贯穿于书写传统、题材内容与审美风格的全过程。渔父词、竹枝词等南方专属词调的传承，江浙胜景、岭南风物的细腻描摹，以及清空婉约、空灵

幽谧的风格特质，共同构成了释家词鲜明的南方文化印记。词僧地域的南方化分布，生动体现了地域文化基因对文学表达的深层塑造，印证了文学创作对地域精神的主动呼应，最终形成了宗教哲思与地域诗性交融的独特文学景观。从“文学地理”视角检视释家词创作，可有效拓展释家词，乃至佛教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跨学科的实证支持。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理论视角的深化，词僧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亦将揭示更多关于中国文学地域性生成的文化密码。

### 参考文献:

- [1] 董维芳. 新世纪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综述[J]. 青年文学家, 2025(21): 119-121.
- [2] 高慎涛. 北宋诗僧地域、宗派分布的不平衡及原因分析[J]. 前沿, 2009(08): 170-173.
- [3] 李舜臣, 欧阳江琳. 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J]. 武汉大学学报, 2010(05): 574-581.
- [4] 韦德强. 元代中后期诗僧地域分布考述[J]. 百色学院学报, 2011(01): 108-115.
- [5] 彭敏.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J]. 湖南大学学报, 2016(03): 115-120.
- [6] 李舜臣. 南北佛教文学不同论——以宋辽对峙时期为例[J]. 学术研究, 2024(12): 169-176.
- [7]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5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24.
- [8]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323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6.
- [9] [清]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263.
- [10] [元]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177+2210.
- [11]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337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27.
- [12]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15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7.
- [13]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86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67.
- [14] [宋]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682.
- [15]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54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8.
- [16] [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M]//大正藏: 第50册. 中国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476.
- [17] [唐]魏征, 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30.
- [18] 李帆.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 南北学派不同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22.
- [19] 诸葛忆兵. 宋代科举资料长编[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196.
- [20] [清]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补辑[M]//词话丛编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113.
- [21] [清]查礼. 铜鼓书堂词话[M]//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481.
- [22]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3.
- [23] 冯乾, 编校. 清词序跋汇编: 卷八[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851.
- [24] [宋]张炎. 词源[M]//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59.
- [25]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7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79.
- [26] [梁]刘勰.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黄叔琳, 注. 李详, 补注. 杨明照, 校注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564.
- [27] [宋]道诚. 释氏要览[M]//大正藏: 第54册. 中国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305.
- [28] 郑阿财. 敦煌禅宗歌诗<行路难>综论[J]. 文学新钥, 2005(3): 1-24.
- [29]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第八十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40.
- [30] [清]万树. 词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62.